

# 新中国翻译文论的话语模式及其启示

张进

(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属于“翻译文论”相关研究要直面翻译文论话语本身。在新中国翻译文论话语中,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四种模式的历史存在及其分布状况表明,文论研究需要保持对多种话语模式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避免某一模式的霸权,克服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以四重式思维追求四种话语之间的共生共成,实现“所说”研究与“所做”研究之间的互补互证。

**关键词:**翻译文论;话语模式;四重式思维;话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J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0)01-0067-06

## 一、直面翻译文论话语本身

新中国翻译文论即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外国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尽管其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学术事实,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却存在着巨大歧异,并因之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表述模式。长期以来,谈及在中国的西方文论,人们通常会将它与“中国文论”分离开来,进而阐发两者之间的“体用关系”或“分化关系”。这种二元思维方式一开始就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对立起来,偏离了作为学术研究逻辑起点的一元化整体视角;而且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容量不足,能够从中析离出来的关系类型也相对有限。比如说,从“体用说”析离出来的关系类型无非是“中体西用”(张之洞)、“西体中用”(李泽厚)和“互体互用”(王岳川)<sup>[1]</sup>,能够从“分化论”中引申出来的关系类型无非是西化论、中化论或互化论。更根本的问题是,它对在中国的西方文论的历史现实缺乏解释潜力。

进而言之,汉语语境中一以概之的“西方文论”之名,还遮蔽着其他思维盲点。首先,这个术语暗示,人们面对的是“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西方文论”,将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与西方语境中的西方文论直接等同起来,但忽略了翻译作为阐释活动对它的选择、损益、再造和改写的实质性成分。其次,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通常设定研究者是在西方文论的逻辑序列中对其进行分析考辨,但漠视研究者及其身处的中国语境对西方文论的不可避免的遴选重塑,进而忽略了理论“旅行”过程的语义增殖或流失。再次,完全囿于西方文论的逻辑序列考察研究其“所说”,将西方文论原典设定为真假优劣的最后判准,以译作与原作是否“符合”为追求目标,忽略了文论话语在“说什么”的同时也在“做什么”甚或“做别的什么”的学术事实<sup>[2]</sup>,忽略了话语在参与社会文化工程时所获得的附加意义,也无法阐明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建设中之“所做”及其意义价值。说到底,这种研究未能充分意识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商讨)和交易的隐秘处”的阐释地位<sup>[3]</sup>。

鉴于此,用一元化的“翻译文论”来命名“在”中国的“西方文论”,既可以避免一开始即陷入二元对立模式的思维局限,又能借助阐释学的洞见而直接切入文论话语本身。恰如我们面对“可口可乐”或“肯德基”时,切莫被“体用”、“分化”之类的问题裹挟而去,而是直面它,考察它的构成、优劣和运营情况。当然,精神产品要复杂得多。在全球地方化的今天,文论研究避免陷入“体与用”、“中化与西化”的伪问题的陷阱之中,这大概也是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契机。

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的“话语的宇宙”<sup>[4]</sup>。新中国语境中千姿百态、范式丛集的西方文论话语,可以“在话语本身中寻找全部辩证法的根源”<sup>[5]</sup>。“话语”具有“对话性”、“行事性”、“事件性”和“能产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实践的“语

收稿日期:2009-1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06BZW006)

作者简介:张进(1966-),男,甘肃会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研究。

言”<sup>[6]</sup>。新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就是这样一种“语言”。同时,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实质上是“学术的叙事学”,是在学术层面上讲述的西方文论的故事<sup>[7]</sup>。这种研究所能直接面对的并非“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已有的研究如何想象和描述那种“事实”的话语和叙事。这是“对阐释进行阐释”,对“眨眼示意之眨眼示意加以眨眼示意”,目的在于扩大人类话语的空间,追踪社会话语的取向,揭示其多重内涵,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社会基础和含义<sup>[8]</sup>。这种话语和叙事同时与话语的模式结构和叙事本身的意识形态性相互关联。

## 二、四重式文论话语叙事模式

鉴于二重式话语模式的容量、类型和阐释效力相对有限,可以尝试运用四重式话语模式,后者基于对话语转义理论的发挥发展。“转义”指喻体对于本体的“乖离”,“转义学”则是关于这种语言现象的理论,自古以来就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但古典修辞学将转义作为正常语言的特殊表达来研究,认定正常语言可以避免转义及其非透明性;而现代转义学则将转义作为语言的普遍的、正常的模式来研究,认为语言转义叙事是“元符码”,是有关现实的信息得以传播的人类普遍基础,而人的思想意识的结构是由非透明的语言基本转义类型构成的。

从历史上看,维柯最早确立了四种基本转义格:隐喻(基于相似原则)、换喻(基于邻接原则)、提喻(基于部分从属于整体的关系)和反讽(基于对立性),并将它们与人类文化史的各个阶段对应起来,发现了语言与现实、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史深层的“诗性”<sup>[9]</sup>。弗莱将它与情节编排的四种模式即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关联起来。怀特将之引向普遍的历史叙述,与四种论证解释模式即形式型、机械型、有机型和语境型以及四种意识形态含义即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包括虚无主义)对应关联起来。文学理论家邦尼卡斯尔将这种四重式和四阶段论结合起来,与一个“文学学生身上的反应”等心理接受过程对应关联起来<sup>[10]</sup>。至此,四重式话语模式发展成为一个体大虑周而整饬简明的理论体系。“四重式”并不一定就优于“二重式”或“三重式”,但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用来揭示研究对象更复杂的品质。我们结合相关理论家对其要旨的研究总结<sup>[11]</sup>,联系新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加以说明。

就话语转义模式而言,“隐喻实质上是再现的,换喻是还原的,提喻是综合的,而反讽则是否定的”<sup>[12]</sup>。隐喻对应着情节编排中的“浪漫剧”,具体表现为“如愿以偿”;在论证解释上是形式型的,它通过对事件进行客观再现和精确描述而解释论证;在意识形态含义方面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即否认制度和权威对人的用处;在心理过程上则表现为“认同”,即主体与其对象之间是一种“情人”关系,发现对象是一个有趣的领域,倾向于命名事物,或学习已被承认的事物的名称。运用于对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研究时亦复如此,趋于认同、强调西化。

换喻对应着情节编排中的悲剧,表现为“法则启示”;在论证模式上是机械型的,即通过将某种局部的法则确定为“因”来解释作为“果”的其他部分;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是激进主义的,即要求改变和瓦解现状;在接受过程中试图“分析”对象而使研究者成为“分析家”,通常是当你对象起因及其社会背景感兴趣时出现的,因为一个层次的经历(文本,阅读的经历)同另一层次的生活(作者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可能被另一层次的生活所解释。在对待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时则趋于“简化”、强调中西差异、逻辑序列的不同和“异因必异果”。

提喻对应着情节编排中的喜剧,表现为“调和化解”;在论证解释模式上是有机型的,通过将各种条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来解释它们作为部分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地位;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是保守主义的,极力维持现状;在接受过程上倾向于完整化和理想化,力图从外部表象转移到产生它们的内心真实,认为部分的本质意义与整体有关。这个阶段造就“领导者”,倾向于从对象的精神本质层面把握对象。在对待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时趋于“综合”,强调中西文论精神整合的重要性,以及“和而不同”。

讽喻对应着情节编排中的讽刺剧,表现为“反复无常”;在论证解释上是语境型的,即通过对事件得以发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描述而解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则要么是良性的自由主义,即相信人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么是恶性的虚无主义,认为人没有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接受心理上,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理解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认识到这些特征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和不完整的,并非普遍的,因此要对已经建立的整体展开“一个解构的过程”,这个阶段造就“解构者”,重在分析自我;在对待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时趋于“否定”、“自我批判”和“质疑反思”。

前三类研究者对应于米勒所说的“机敏型”,第四类是“盲乱型”。前者认为最终能找到理性秩序,坚信运用逻辑线索可洞察存在之渊;后者则大多力图使逻辑线索伸向荒诞之域。米勒认为盲乱优于机敏,盲乱型的研究者从教条主义的梦中惊醒,始觉其沉醉于中的信仰和诺言,原本是一场空话<sup>[13]</sup>。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以不同方式看待文学理论批评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简单地追求符合“事实”却无

法解决最重要的争端,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以便找出一些解决范式冲突的方法。某个特定的研究者可能在特定时期处在这些领域的特定阶段上,但由四个阶段及其总体图式构成的视野,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 三、新中国翻译文论的四重式话语

二重式话语叙事的解释潜力已基本耗尽,很难继续在新中国翻译文论问题讨论中发挥知识生产作用。我们试图以一元化的“话语”为研究对象,从四重模式与文论话语构成的网络关系出发,研究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呈现对象的类型性状。

#### 1. 隐喻—浪漫剧—形式型话语

这类文论话语的基本取向是“认同”,是“情人式”地拥抱西方文论,认为西方文论从名词术语到方法观念都具有普世性,设定中国语境对其无实质性选择和影响。这种话语景观对应着新时期翻译文论的第一个十年,大致是从1978年到1989年间。

在这种叙事类型中,西方文论作为整体被理解成浪漫剧主人公,历经千难万险和人事沧桑而终无改变,剧终时还是戏剧开始时的样子,通常依然年轻美丽。它认为西方文论的潜在价值在我国未能全部实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译介不足、介绍不全、认识不够;一旦完成这些工作,西方文论在中国终会“如愿以偿”。李泽厚在1980年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上强调,“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他要求放手翻译,“一方面应该提倡字斟句酌,力求信、达、雅,另一方面又不求全责备,决不因噎废食。总之,有胜于无,逐步提高和改善”<sup>[14]</sup>。总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被浓墨重彩地征引,用于论证翻译的合法性和重要性<sup>[15]</sup>。总序研究者动手“拿来”,倡言“西化”。显然,这种研究并未将问题放在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形态差异性的平台上来对待。

这类西方文论研究通常采用“形式型”解释,重在发现西方文论的独特性,表现为独特的术语、概念、方法、观念和思想,在造就了当代中国文论史上的术语大换班和多元话语交织的文论奇观,术语迭出、方法遽变、观念翻新、思想日出,这在“方法论年”(1986)和“观念年”(1987)达到了顶峰。

这类西方文论叙事的重心,既不在于西方文论所从出和所抵达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也不在于揭示其话语表述与其真实内涵之间的背离和矛盾,而只在于概念本身以及思想方法所引起的感动。这种术语概念和思想方法,尽管在大量套用中扩大着自身的话语空间,但这种孤悬起来的术语概念却无益于学术的考究和批判分析。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人将之批评为“思想重于学术”的研究<sup>[16]</sup>。这实质上是脱离其语境的术语、方法和观念的大量流通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对每个个体的意识进程和心理过程来说,这种与研究对象之间情人式恋爱关系是初级阶段的研究,必然要向下一阶段转移,也终究会意识到自己这一阶段研究的不成熟<sup>[17]</sup>。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曾经采用这种模式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发生了兴趣和方法的转变,成为其他话语模式的信仰者,并对这种话语模式进行了清算。

尽管这类话语流露出某些幼稚、狂热和一厢情愿,但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文论作为一个多维立体的历史存在,应该始终向这类研究开放。总会有新进者源源不断地成为此类研究者,成为这种范式的实践者。尽管对于研究个体来说这是初级阶段,但当我们把“在中国的西方文论”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来对待时,这一阶段的研究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法的。这一学术事实要求我们的西方文论研究共同体应该对这种研究类型保持宽容心态。正是这个阶段研究者特有的热情,促动一批又一批研究者投身其中,造就新生的研究队伍。它甚至要求我们的西方文论教学做出调整,针对处在不同阶段的学生,施以相应的文论叙事模式。

#### 2. 换喻—悲剧—机械型话语

这类话语的基本取向是“简化”或“还原”,是分析家式地调查话语所从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进而将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因素推定为“因”,将文论的发生发展看成由之造成的“果”,从而达到一种因果论的把握(尽管事实上可能有更多的或另外的“因”,有时甚至“互为因果”)。这种话语景观对应着新中国十七年和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的翻译文论(大致从1989年到1999年间)。

它设定西方文论处在与中国文论完全不同的语境和逻辑序列中,是由其特殊的“因”造成的不同的“果”,两种文论本质上无法通约,其间差异在术语、方法、观念层面上都会表现出来。从术语层面看,“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因而无法通约”。“‘中西比较诗学’这一称谓在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思想文化差异,以及现代汉语语境下这两大语词的语义空间差异,独断式地假定了‘文论’同一于‘诗学’(文学理论)的同一性”<sup>[18]</sup>。术语的不同意味着“起因”上的差异,因此论证这种“结构差异”就成为合理合法的学术

工作。无须细究即可发现,中国传统是“诗文评”,不同于“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缘此可以推论两者在“思维对象、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方面的不同<sup>[19]</sup>。基于这种思维模式,甚至出现了“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性”的观点<sup>[20]</sup>。

在这种叙事中,西方文论作为整体被理解为悲剧主人公,其在中国的历程被解释为一种悲剧,而造成悲剧的“原因”正在于西方文论本身的逻辑序列不同于中国。作为悲剧主人公,西方文论可能“并不坏”,可一旦进入中国语境,就必然地对其自身和中国文论都是一种伤害,它甚至导致了中文论的“失语”,以致中国当代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没法说话,这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结果<sup>[21]</sup>。

这种解释模式是机械论的,它强调因果关系研究,并将因果逻辑设定为根本法则。同因同果,异因异果。由于中西方文化圈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之间缺乏可比性,“比较诗学”的前提是可疑的:非西方批评家用西方标准来论证其自身文化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所有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种不稳定的前提上<sup>[22]</sup>。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理推论是“激进主义的”,即必须对当前的文论状况做出“结构性改造”才能消除这种悲剧。

研究者试图寻找和确定事物之“因”,这种心理事实上拓展了理解的范围。与隐喻阶段相比,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推进。在中国新时期第二个十年的西方文论研究中,人们不再沉浸在观念方法之中,而是着力探求思想方法得以形成的“因由”。这种工作似乎更具学术性,但一味如此则又显得思想性不足,因此有“学术重于思想”之讥。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它可以通过因果还原而对问题做出“片面深刻”的研究;其潜在危险在于,以片面结论或错误归因排斥其他研究,在处理中西方文论关系时,将中文论当前的问题都归因于西方文论的影响或挑战,进而演变为针对西方文论的“拒绝主义”和“复仇心理”。

总之,这类西方文论研究者有分析事物的愿望,通常是把对象放在其历史背景和理论序列中加以研究。有细节知识的积累,但没有强烈的整体感,有实证主义倾向。当然,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从社会历史方面展开研究,这始终是深入的整体研究的必要准备。我们应该力求对这种研究的过激的意识形态倾向加以限制,以免将中西方文论对立起来,防止滑向全盘拒绝的泥淖。

### 3. 提喻—喜剧—有机型话语

这类西方文论叙事的基本取向是“综合”,认为对象的各部分之间尽管存在差异,但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各部分通过精神观念上的共通性而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理想的整体。这种取向的基础通常导向结构主义式的研究。以这种模式研究西方文论的人颇像一个“领导者”,相信能从全局上把握中西方文论之“道”、“心”或“精神”(尽管这种它们可能不过是缘于自己特定立场和情境的设定)。

在这种话语中,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整体被理解成喜剧主人公,中国语境则构成其境遇,尽管主人公与其境遇之间实际上存在差异和矛盾,但在精神上可以“调和”,可以互通,即“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喜剧的运动常常是从一种社会环境到另一种社会环境的运动,它通常走向一个愉快的结尾。因此,西方文论在中国所遇到的对立冲突不是根本性的,必将以“调和化解”而告终,对话而非独白、沟通而非自封才是应该采取的态度。

它采取“有机论”解释方式,倾向于将中西文论理解为一个有机体,“单个实体成了所合成的整体的部分,而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在性质上也与之差异”。“综合实体要比叙述过程中分析或记述的任何单个实在都重要得多”<sup>[23]</sup>。这样,中西文论关系的历史会被描述成走向整体综合的有机体的进程,它们的单个实体可能不同,但精神上相通,这种相通的东西,用一句歌词来概括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因此可以“交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24]</sup>。但是,相通之处并不在实体意义上的术语或字句,而是“心理”、“道术”,是通过“擘肌分理”和“取心析骨”而达到的“莫逆冥契”的诗心诗意,它“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传统诗文本本身,而且存在于诗文与俗语、谣谚、曲艺等之间,更存在于中西诗文之间”<sup>[25]</sup>。

从意识形态蕴涵上说,这类西方文论研究一般持保守主义立场。它用植物般缓慢生长的类比来看待社会变迁。它并不是抵制任何变化,但它抵制结构性变化。在对待中西文化关系时,它提倡通过“文化交往主义”解决问题,以便彻底抛弃文化中心主义,将中西文化关系推向深入<sup>[26]</sup>。可以说,“中西文论交往对话”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应对西方文论的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其可选择的途径之一便是“西方文论引进与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相结合<sup>[27]</sup>。

这种文论叙事模式的调和性质,使其观点相对温和,因而也常常是持其他叙事模式者试图建构其理论体系时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这种叙事模式背后的思维盲区只有在第四种模式的映照下才能完全显露出来。

### 4. 讽喻—讽刺剧—语境型话语

这类话语的基本取向是“否定”和“自我批判”,研究者以解构家的姿态,通过揭示文论话语言实相悖、言意相反的反讽性差异而使之解体,解构本质主义的真理话语和宏大叙事,强化话语的历史性、具体

性和意识形态性分析。相对于第三种类型,研究者突然意识到先前认识到的真理不过是建立在他作为优势阶层(社会上层、白人或男性等)的条件之上,其实对于大部分非优势阶层(社会底层、有色人或女性等)而言,他认为“对的”东西基本上是错误的或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会将第三阶段的哲人式的领导者变成一个“异化、贫乏、毫无创造力的虚无主义者”。这种取向可能造成西方文论话语之能指与所指之间对应链条的断裂,因而导致话语及其所指系统的解体(但它同时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能在能指与新的所指之间确立某种新的对应关联)。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式的,因为它是在修辞性语言可能误用这一自觉意识中被使用的。这种话语景观对应着我国新世纪以来的翻译文论。

这类翻译文论叙事,将西方文论作为一个整体解释为讽刺剧的主人公,讽刺剧的内容是“反复无常”。西方文论在中国旅行,其价值和功能都经历着不可避免的变迁,但又无目的可言,无规律可循。西方文论在中国,这不单纯是一个它“说什么”的问题,也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它之“所做”,不仅涉及西方文论本身的内涵,而且涉及研究者的立场,涉及研究者在自己的语境中如何选择立场,如何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批判的问题。这种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比如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假如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地研究,那它就只能对西方文化的解构具有价值,而无法与中国问题相切。然而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sup>[28]</sup>。这种立场,使其成为反讽式的研究者。

其解释模式通常是“语境论”的,即将事件置于其发生的情境中,它就得到解释,通过揭示它与其他同在一个历史情境下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解释。这是一种“横向超越”,它不满足于“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sup>[29]</sup>。从而超越到不在场或未出场的现实事物中去,这也是它异于前三种解释模式的根本特征所在,形式论只是局限于在场的自身之中并对自身形式展开研究,机械论是超越到同样在场的现实事物并以之为“因”,有机论是超越到某种高于现实事物的“精神”或“观念”中去。它们一定程度上都是“纵向的”,都有将所超越到的事物“实体化”的倾向。

后现代文论话语属于反讽话语,其基本宗旨是质疑现代性的本质主义,涉及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客观本质、永恒真理、绝对基础、唯一视角、纯粹理性、终极意义、标准答案等相关命题、观念的质疑与否定。卡勒的《文学理论》是新时期引进的此类文论著作,它声称文学理论的总体倾向是:跨学科性、分析性、拆解常识和质疑基本的知识范型<sup>[30]</sup>。它重在解构已有的关于文学、主体、性属、身份等的学说。它也是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中国文论著作者的参照经典,其中的观点被大量引用,王一川在其《文学理论·引言》中就引证5次之多,南帆在其《文学理论·导言(新读本)》中亦引证5处。

然而,他们都试图在引证卡勒的解构性基础上有所“建构”,认为卡勒对文学理论的概括“不一定适用于一种具体的文学理论框架……我尝试在这里提出并阐述我自己的一种文学理论框架”<sup>[31]</sup>。文学可能没有什么本质可言,但可以在积极的(或良性的)意义上考察其的“属性”,从而形成一种文学理论。“文学是十足的制造混乱的代名词”<sup>[32]</sup>。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文学根本没有本质,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关于文学的‘理论’”<sup>[33]</sup>。“文学观念的形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独立。历史语境仍然限定了文学观念的规模和地位”<sup>[34]</sup>。因此,“文学理论”是“开放的研究”。

从中可以看到,卡勒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作为西方文论引用介绍到我国后,被改写为一种偏于建构的“反讽式”理论话语。它在进入新语境时经历了“语境的拆除”与“语境的重建”过程,进而“产生了文本或文学的准语境”。卡勒的文学理论观点,在这种“拆除”和“重建”中,由一种反讽性的虚无主义解构话语,变成了一种讽刺性的自由主义建构话语,言实相背、“言行不一”。

#### 四、文论话语模式的启示意义

我们发现,新中国的翻译文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四种文论话语模式也都在相应的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参照四种模式综合考量,也存在三个突出的倾斜现象。

一是在历时性维度上,四种模式中的某一种在历史的特定阶段形成了“霸权”局面,出现了翻译文论风景的单一化。这不利于各种话语的正态分布和共成互补。新时期以来四种模式之间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从隐喻主导向讽喻主导转化的印迹,但这并不完全是进步论意义上的。换言之,从“认同”到随后的“简化”、“综合”和“否定”,这并不一定只是认识的深化,而更多地表现为某一模式在特定时期处于垄断地位而抑制了其他话语。比如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认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导致了不平衡的研究局面,而“认同”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当时就得到其他话语模式的质疑和校正。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如“文革”期间,换喻模式则被推到了极端,使其他话语失去了容身之地。

二是在共时性维度上,人们对西方文论之“所说”研究大大多于“所做”研究,也就是说,人们只关注西方文论在其自身的逻辑序列中的“意思是什么”、“说了什么”,但不大关心它在脱离其原初语境之后的“意义是什么”、“做了什么”、“如何做”、“做得怎么样”。我们并不陌生西方文论中的“内部研究”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但可能忽视了它被引入中国之后之所做与它在西方文论序列中之所说和所做的不同,忽略了它在中国所引发的“向内转”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要加强从话语行为角度研究文论话语之所说与所做,强化翻译文论研究的语境意识。

三是在思维模式上,我们过多受制于中西二元对立的二重式思维的限制,动辄掉入“他化”或“化他”的宏大动机的陷阱之中,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事实上,如果从一元化的翻译文论切入,以四重式话语去审视,强调四种话语之间的互补互用,则无论是哪种话语,不管是“认同”、“简化”、“综合”还是“否定”,都是必要的解释方式,都会成为翻译文论风景上的必要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也都是在满足相应学习者、研究者的需要而同时在壮大和优化着研究队伍。

总之,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应该强调四种模式的共存、交往和互补。尽管某些模式,如提喻—喜剧模式,看上去有更大的合理性和更多的支持者,但这决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定于一尊。西方文论本身的复杂性、中西方语境的复合性和研究者队伍的多层次性,要求我们的西方文论研究模式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 参考文献:

- [1] 王岳川.发现东方[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35.
- [2] 杨玉成.奥斯汀:现象学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1-82.
- [3]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
- [4]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93.
- [5] 保罗·利科尔.解释学和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35.
- [6]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26.
- [7]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 [8]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2.
- [9] 维柯.新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0.
- [10] 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08.
- [11]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54.
- [12]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7.
- [13] 卡勒.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3.
- [14] 霍埃.总序[M]//批评的循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15] 萨特.总序[M]//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
- [16]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J].现代与传统,1995(1).
- [17]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J].文艺研究,1998(3).
- [18]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3.
- [19] 杜书瀛.钱竞.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2.
- [20] 方朝晖.“中国”与“西学”[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51.
- [21]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文论话语[J].东方丛刊,1995(3).
- [22] 泰特罗.本文人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9-60.
- [23]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
- [24] 钱钟书.序[M]//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5] 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5.
- [26] 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76.
- [27] 孙绍振.西方话语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5).
- [28]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 [29]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
- [3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
- [31] 王一川.文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7.
- [32] 卡勒.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9.
- [33]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
- [34]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4.

责任编辑:郑琦)